

中外关系史研究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Vol.1

第①辑

李 兴◎主 编 陈奉林◎副主编

全球史视域下的东西方比较：逆转时间视角与学科建构思考

近代日本人游记所见中华文明与中日关系

战后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政治化：两种战略的博弈

西辽帝国对中亚的治理与文明的多元共生——兼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大国协调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理论探讨

全球史视域下的东西方比较:逆转时间视角与学科

建构思考 李 兴(3)

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轨迹刍议 袁南生(37)

中外关系史

西辽帝国对中亚的治理与文明的多元共生

——兼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魏志江 卢颖琳(59)

近代日本人游记所见中华文明与中日关系 陈奉林(77)

战后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政治化:两种战略的博弈 魏楚雄(104)

培育中国的农业工程师

——国民政府农林部与美国万国农机公司的

合作(1945—1948) 张瑞胜(136)

《环球航行记》与18世纪欧洲中国观的转变 陈鸣悦(160)

探秘“外交核爆炸”

——中国学术界对中法建交史的研究述评 姚百慧(179)

中国搪瓷与尼日利亚家用容器的历史变迁 刘少楠(197)

区域国别(史)

- 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大国协调历程 汪 波 穆春唤(231)
19世纪老乔治·凯南对俄国国家形象的建构研究 戴博元(259)

翻译与综述

- 辛亥革命前后工部局万国商团有关海军参与租界防卫计划的
相关史料选译 江天岳 贾 浩 郝小雯(277)
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内外关系史研究计量分析
(2012—2021) 林霄楠 肖 明 吴 涵 陈柯文 王紫晨(306)

《中外关系史研究》稿约 (325)

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大国协调历程

汪 波 穆春唤*

【内容摘要】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宣布改革开放后，外交上逐渐进入了比较务实的阶段。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从斡旋巴勒斯坦问题和展开穿梭外交处理海湾危机开始，全面开启了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大国协调历程。尽管在最初阶段囿于自身实力，中国还无法对中东事务产生实质性影响，但这种参与却为政治和谈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进入21世纪后，中东成为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主要的能源来源地，中国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协调能力也不断提升。中国不仅继续对巴勒斯坦问题展开协调，并且还成为伊核问题政治和谈中的重要一方。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在协调中东热点问题上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关系新原则，更为广泛地参与到巴以问题、伊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利比亚问题、也门问题等热点问题的全面协调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积极作用。

【关键词】中国外交；外交协调；中东；热点问题

中国与中东地区关系源远流长，双方之间有着悠久的文明交往史。新中国成立之初，出于对中东人民所遭受的殖民主义压迫的感同身受，

* 汪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穆春唤，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公共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对中东地区的反美、反英斗争进行了声援。从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到1979年中国宣布改革开放，中国逐步登上了国际舞台。随着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深度和广度也持续拓展。在此过程中，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参与解决地区冲突问题方面日益扮演积极角色，在地区冲突各方之间以及在斡旋者之间的协调扮演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①

作为坚持走和平与发展道路的大国，中国虽然不是中东地区纷争与矛盾问题的当事方，但协调中东地区热点冲突问题的解决对于中国来说也有着重要意义。首先，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与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的协调，既体现了中国是国际社会中的负责任大国，也能够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其次，中东地区是中国化石能源的主要来源地，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最后，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规划中，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是保障“一带一路”畅通的关键。

一 中国参与中东问题大国协调的初期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2年)

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在这一时期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加之中东地区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也比较有限，因而在协调中东热点问题时总体比较超脱。本着谨慎参与、量力而行的原则，中国这一时期主要是建设性地参与了巴勒斯坦问题和海湾危机的外交协调。

(一) 初步协调巴勒斯坦问题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地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遗留问题，一直

^① 孙德刚：《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冲突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西亚非洲》2015年第4期。

被认为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和根源。自 1948 年 5 月以色列宣布建国后，迄今阿以双方共爆发了五次战争冲突。由于巴勒斯坦问题中的一系列核心矛盾长期悬而未决，造成了中东地区的持续动荡，因此，可以说巴勒斯坦问题左右着中东的现实与未来。

1979 年后，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形势的变化做出了准确的判断，认为世界主题已经从“战争与革命”转为“和平与发展”。由于摒弃了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所造成的障碍，中国调整了在巴以问题上完全对巴勒斯坦一边倒的政策取向，开始强调承认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各国都应该“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劝说巴以双方进行和平谈判。1984 年，中国政府首次支持通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安理会所有五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国际会议来解决中东问题。^① 1988 年 9 月，中国外长钱其琛提出了中国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五点建设性主张：中东问题应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阿拉伯被占领土应予以归还；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应予以恢复，以色列的安全也应得到保证；支持召开有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中东国际和平会议；支持中东各方进行各种形式的对话，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相互承认。^②

冷战结束后，中国更加明显地希望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作用，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各方通过对话和谈判寻求争端解决，通过公平和公正的方式来实现和平与稳定。海湾战争结束后，李鹏总理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做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中东问题“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阿拉伯被占领土应予归还，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应予恢复，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应得到尊重和保障。我国已经同以色列建交，并参加了中东和谈会议，愿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作出贡献。”^③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访问叙利亚时重申中国支持召开由联合国主持的、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所有有关方面参加的中

^① Du Xianju, China and Israel: Five Decades of Relations, Ph. D. dissertation, Brandeis University, 1998, pp. 164 – 165.

^② UN General Assembly, 45th Session, Provisional Verbatim Record fo The 12th Meeting, UN General Assembly Document A/45/PV. 12, October 5, 1990.

^③ 《1992 年政府工作报告——1992 年 3 月 20 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载《政府工作报告汇编（1954—2017）》（下），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70 页。

东问题国际会议。^① 1991 年中国外长钱其琛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表示，中国“支持中东有关各方进行他们认为合适的有利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各种形式的努力”^②。

1991 年 10 月，阿以恢复和谈进程。中国虽未直接参与马德里和会第一、二阶段的会议，但中国政府表达了对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的支持。1992 年中以正式建交后，中国开始正式参与到马德里中东和会中，并主持召开了中东多边谈判第三阶段水资源专题会议。1993 年 9 月 13 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白宫签署了《奥斯陆协议》。这一历史性协定为巴勒斯坦人民在加沙地带和西岸实现自治开辟了道路。它标志着一个谈判解决永久地位问题的进程的开始。1995 年 9 月 28 日，巴以双方又签署了《奥斯陆第二号协议》，将《奥斯陆协议》的执行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虽然《奥斯陆第二号协议》的签署是巴以和平进程的巨大突破，然而此后巴以双方在核心问题上已再难达成妥协，和谈开始止步不前。1995 年 11 月 4 日，积极推动巴以和谈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被一名犹太极端分子刺杀，这一事件对和平进程造成了极大打击。1996 年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大选中胜出后上台，其在定居点和领土问题上都坚持强硬立场。中东和平进程停滞不前。

在巴勒斯坦局势不断恶化之际，2000 年 4 月 12 日至 18 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分别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是中国国家元首历史上首次出访巴以两国，也是在中东和平进程陷于停滞时的一次重要访问，表明了中国希望推动巴以和谈的立场。2000 年巴勒斯坦爆发第二次“因提法达”运动，巴以双方都承受了空前的死伤。江泽民分别向巴以双方领导人致口信，表示对巴以冲突的关切。江泽民指出，巴以和谈正处于关键阶段，中国呼吁有关各方立即采取措施，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并停止一切不利于和谈的言行。^③ 11 月，在与来访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

^① 吴文斌、吕志星：《叙利亚总统会见中国代表团》，《人民日报》1991 年 5 月 31 日，第 6 版。

^② UN General Assembly, 46th Session, *Provisional Verbatim Record of The 8th Meeting*, UN General Assembly Document A/46/PV. 8, October 2, 1991.

^③ 《江泽民就巴以冲突向巴以领导人致口信》，《人民日报》2000 年 10 月 13 日，第 4 版。

(Arafat) 的会晤中江泽民再次敦促巴以双方在“土地换和平”原则的基础上，以灵活务实的态度恢复和谈。2002年6月，外交部副部长杨文昌分别出访巴以两国，杨文昌对两国领导人表示，中东的历史已经表明，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通过政治谈判，才能实现阿以关系正常化。中方一直在通过各种途径做劝和工作，希望双方能予积极配合，为停火创造条件。^①

由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正义的立场，中国得到了巴人民的信任，2002年9月，在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提议下，中国设立了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这是中国首个就周边以外地区的重大热点问题设立的特使工作机制，为中国更好地参与中东和平进程提供了制度保障。首任中东问题特使王世杰大使上任后旋即前往中东，访问了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等中东六国，并会见了美国、俄罗斯、欧盟及联合国中东问题特使。在会晤中，王世杰阐述了中国在中东问题上支持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土地换和平”原则，以及致力于推动中东和平事业的立场。^②

（二）海湾危机中的穿梭外交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推翻科威特政府，宣布科威特成为伊拉克第19个行省，海湾危机由此产生。伊拉克与科威特的矛盾根源由来已久，1921年伊拉克独立时，科威特曾是伊拉克的一个省，1961年才获得独立。但伊拉克却坚持科威特是自己领土的一部分。伊拉克还不满于科威特在两伊战争中力挺伊朗。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经济深陷困境，伊科双方围绕着石油、欠债等问题龃龉不断。最终，伊拉克选择武力吞并科威特，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

中国与伊拉克和科威特两国都有着良好的关系，和平解决危机既符合中国一贯的外交原则，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根据海湾

^① 《阿拉法特会见外交部副部长杨文昌》，2002年6月21日，<https://www.mfa.gov.cn/chn/pds/wjb/zzjg/xws/xgxw/t6255.htm>, 2022年5月6日。

^② 余国庆：《大国中东战略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页。

地区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提出了一系列公正、合理解决海湾危机的建议。^① 危机发生当天，联合国安理会应科威特要求紧急召开会议，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道豫在会上表示，伊拉克和科威特两国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希望两国能和平相处，并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在这次会议上，安理会通过了第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出科威特。

为切实做好危机的化解工作，中国采取了积极的外交行动。8月4日，杨福昌副外长分别会见了伊、科两国驻华使节，呼吁伊拉克尽快撤军，并提出越早越好，希望两个阿拉伯兄弟国家通过谈判解决彼此分歧。^② 11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专门展开了不带解决方案、不当调解人、意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为期七天的中东穿梭外交。^③ 钱其琛先后访问了埃及、沙特和约旦等地区国家，以及当事国科威特和伊拉克，成为海湾危机期间唯一到达巴格达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长。钱其琛外长就和平解决海湾问题与各国进行了探讨，希望各地区国家能够利用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为和平解决危机做出努力。在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会晤中，钱其琛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海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关切，以及希望危机最终得到和平解决。^④ 在与伊拉克副总理兼外长阿齐兹的会谈中，钱其琛明确表示伊拉克占领科威特是不可接受的，伊拉克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国际社会希望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为此，伊拉克应在撤军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态度。^⑤

在钱其琛外长出访埃及期间，美国国务卿贝克（Baker）以“加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关于伊拉克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并恢复科威特主权的一致立场，以便有可能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为由，提出与其亲自会面。会谈中，钱其琛指出：“只要和平的希望还存在，哪怕只有一线希望，国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海院战争全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②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③ 刘中民、范鹏：《中国对伊拉克问题的外交政策》，《中东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

④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⑤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际社会就应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和平解决所需要的时间，也许要长一些，但后遗症会少一些”。^①

1990年11月29日美国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678号决议，其中设定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的最后期限为1991年1月15日，并授权“以一切必要手段执行第660号决议”。第678号决议事实上为美国为首的联军武力解决海湾危机提供了合法性。中国由于不赞成武力干涉，因而选择了弃权票。在国际社会的所有外交努力都未能实现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情况下，1月17日，在第678号决议的最后通牒过期后，联军对伊拉克展开了代号“沙漠风暴行动”的强烈空袭行动，海湾战争打响。

尽管海湾危机过程中，中国的外交协调努力最终未能促成危机的和平解决，但它仍然是这一时期中国协调外交的典型案例，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一员的担当。

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基于对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一认知，从协调巴勒斯坦问题和海湾危机入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中东地区扮演着化解危机和促进地区和平的积极角色。但需指出的是，这一阶段中东的热点问题总体与中国国际利益没有直接联系，中国的参与协调外交的介入程度十分有限。^②

二 中国参与中东问题大国协调的拓展阶段 (2003年至2012年)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体系加速转型，中国也加快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中国越来越认识到，协调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既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①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9、83页。

^② 刘中民：《中国的中东热点外交：历史、理念、经验与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1期。

应承担的责任，也是促进中国与地区国家双边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此期间，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中国应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与此同时，21世纪伊始，中国经济加速起飞，能源需求增长强劲，中东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石油来源地。鉴于该地区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意义，中国也加大了对中东的关注力度。在这种新的背景下，中国开始转变过去有限度介入中东事务的做法，开始在协调巴勒斯坦问题和伊核问题的政治解决方面更多地“有所作为”。^①

（一）持续协调巴勒斯坦问题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中东关系不断深化，中国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加深与中东国家关系，以及提高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为此，中国继续支持中东和平进程，提出更多具有建设性的主张，并致力于在巴以问题各方之间做好劝和促谈的协调工作。

在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中东暴力升级后，美国联合俄罗斯、欧盟和联合国组成了中东问题“四方”，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巴勒斯坦问题。虽然中国被排除在会谈之外，但中国方面表示了对四方会谈达成的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的支持。2004年12月，国务委员唐家璇在访问巴以时，提出了解决中东问题四点主张，其中包括支持重启“路线图”计划，呼吁国际社会加大促和力度，并明确表示中国支持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②对于以色列与加沙的“脱离接触计划”，中国外交部表示称赞，并希望巴以以此为契机，尽早恢复和谈。

在巴以谈判中断多年后，2007年11月，美国协调召开了安纳波利斯和平会议，巴以双方宣布重启和谈。中国外长杨洁篪出席会议，并就

^① 李伟建：《从总体超脱到积极有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中东外交》，《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5期。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国为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和促进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所采取的步骤的国家报告》，2005年5月2日至5月27日，<http://www.china-un.org/chn/zgylhg/cjyjk/npt/t196286.htm>，2022年6月6日。

推动和平进程走出僵局提出五点主张：第一，尊重历史，彼此兼顾，把握和谈方向，在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和“阿拉伯和平倡议”的基础上，启动最终地位问题谈判，推动解决边界、难民、水资源等问题，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第二，摒弃暴力，排除干扰，坚定和谈信念；第三，全面推进，平衡发展，营造和谈氛围；第四，重视发展，加强合作，夯实和谈基础，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巴人道援助和发展援助，赞赏有关方面提出的区域经济合作计划；第五，凝聚共识，加大投入，加强和谈保障。^①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巴以领导人在此次会议上建立共识，并达成和平协定。但由于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分歧严重，和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2009年巴勒斯坦形势正在经历新的考验和变化，加沙冲突造成重大伤亡，以色列成立了新政府，巴勒斯坦两大派组织也正在为实现和解进行谈判。4月，杨洁篪外长出访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叙利亚等中东四国，他就新形势提出了促进中东和平进程的五点建议：第一，有关各方应坚持和谈的大方向，以联合国有关决议、“土地换和平”原则、“路线图”计划、“阿拉伯和平倡议”为基础，坚定推进和谈进程。第二，各方应采取积极措施，尽快恢复局势稳定，不断积累互信，为和平进程向前发展创造条件。第三，要坚持“两国方案”，早日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实现巴以“两个国家”和睦相处。这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出路，也是中东和平与安全的根本保障。第四，国际社会应持续关注中东问题，为各线和谈以及巴内部团结和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第五，巴以、叙以、黎以等各线谈判应协调推进，以实现中东地区的全面和平。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继续同有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为推动中东问题的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② 2010年10月，

^① 《杨洁篪在中东和会上阐述中方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2007年11月27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332/xgxw_676338/200711/t20071128_9289321.shtml，2022年6月6日。

^② 《杨洁篪接受专访就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提出五点主张》，2009年4月26日，http://www.gov.cn/jrzq/2009-04/26/content_1296719.htm，2022年6月6日。

中国中东特使吴思科大使表示，中国寻求“各方在各种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和妥协的努力”，促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共同承担责任、改变现状。^①

（二）加强伊核问题的协调努力

2002年8月，伊朗流亡组织“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披露伊朗正在进行秘密的核项目，包括位于纳坦兹的核设施和阿拉克的重水厂，引发国际社会恐慌伊朗可能正在研发核武器。在伊核问题上，中国的基本立场和原则是“支持伊朗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合作，希望有关各方继续保持对话和协商，通过建设性合作，使有关问题在机构框架内尽快妥善解决。”^② 尽管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对伊朗实施制裁的若干决议均投了赞成票，但中国仍然坚持制裁和施压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伊核问题，安理会应创造性地寻求重启谈判的办法。2006年4月，伊朗提炼出低浓缩铀，伊核危机形势急转直下。在此关键时刻，中国紧急派出外交部部长助理崔天凯，于14日到18日先后奔赴伊朗和俄罗斯，谋求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2006年6月，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加入了自2003年以来就一直与伊朗进行谈判的法国、英国和德国等欧洲三国，共同组成伊核问题六国（P5+1）与伊朗进行全面会谈。

由于伊核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与伊朗两个大国间的历史与现实矛盾的产物，中国领导人分别对两方展开了劝谈促和工作。2006年6月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与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中表示，中国主张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主张通过外交途径和谈判方式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我们欢迎美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问题的立场，也欢迎美方表示愿意加入伊朗核问题的有关谈判。中方愿同美方保持沟通和协调，为尽早恢复伊朗核问题谈判发挥建设性作用。^③ 在与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会晤中胡锦涛提出希望伊朗通过对话和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全面妥善解决，希望伊朗把握一

① Xinhua News, Chinese Envoy Urges Israel-Palestinian Talks Back on Track, March 25, 2011, http://www.china.org.cn/world/2011-03/25/content_22223097.htm, 2022年6月6日。

② 《李肇星外长与伊朗外长哈拉齐举行会谈》，2003年11月13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172/xgxw_677178/200311/t20031113_8006616.shtml, 2022年6月6日。

③ 《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通电话》，《人民日报》2006年6月2日，第1版。

切有利于推动对话进程的积极因素，尽早同伊核问题六方开展对话，并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采取具体步骤，促进对话进程。^① 2009年10月1日，伊核问题六国首次与伊朗进行了会谈，杨洁篪外长公开呼吁各谈判方致力于增强各方的政治互信，相向而行，从而为谈判营造良好氛围。

自党的十六大起，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外交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责任的期望也在升高，因此，中国对国际热点问题的参与程度在明显加深。^② 除了在促进巴勒斯坦问题政治解决方面更加积极有所作为外，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成为了协调伊核问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方。

三 中国参与中东问题大国协调的深化阶段 (2013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展现了中国外交的新气象。中国进一步明确了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战略定位，更多地承担起对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大国责任，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③ 在中东地区，中国开始更加积极而广泛地参与到包括巴以问题、伊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利比亚问题和也门问题等在内的中东热点问题的外交协调中，并在部分热点问题上形成了更加具体而深入的影响。

新时期中国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大国协调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背景：第一，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地区新老问题叠加，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并产生了强烈的外溢效应，威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第

^① 吴绮敏、陈志新、饶爱民：《胡锦涛会见伊朗总统》，《人民日报》2011年6月15日，第1版。

^② 刘中民：《中国的中东热点外交：历史、理念、经验与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1期。

^③ 陈东晓：《理解新一届中国政府外交的四个关键词》，《世界知识》2014年第1期。

二，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意图及控制能力开始减弱，已不再能够为其中东盟友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第三，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选择将更多的外交政策精力投入到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中，并希望中国能在中东发挥更大的作用。第四，中东在中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继续上升，不断加快的工业化进程让中国对中东地区的能源依赖进一步深化。第五，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中国对外发展的重要规划，中东在地理位置上恰好处于一带一路的中间地带。^①

（一）持续参与巴勒斯坦问题协调外交

自中东剧变后，国际社会普遍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发生动荡和内战的阿拉伯国家以及中东恐怖主义问题。2013年7月，美国国务卿克里（Kerry）尝试重启巴以和谈进程，和谈持续数月后无果而终。巴勒斯坦问题陷入连续数年没有任何进展以及在国际政治议程中被严重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新时期以来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则更趋于成熟。一方面，中国始终坚持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贯彻安理会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另一方面，中国坚持主持正义的原则，为巴以和平提供主张和方案，并试图使紧张的巴勒斯坦局势降温。

2014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大使在第69届联大会议上，向各国代表阐述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即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巴以两国和平共处这一正确方向、巴以两国和平共处这一正确方向，应当将谈判作为实现巴以和平的唯一途径，以及坚持“土地换和平”等原则不动摇，国际社会为推进和平进程提供重要保障等。^② 2017年7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巴勒斯坦阿巴斯总统的会谈中再次提出了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第一，坚定推进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政治解决；第二，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① 汪波、姚全：《新时期中国中东外交思想构建研究》，《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2期。

^② 《中方支持阿拉伯国家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战略》，2014年11月25日，<https://www.chinanews.com/gj/2014/11-25/6812636.shtml>，2022年6月9日。

安全观；第三，进一步协调国际社会的努力，壮大促和合力；第四，综合施策，以发展促进和平。^① 倡议得到了巴方的积极回应。

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贯彻极端亲以反巴的方针，单方面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绕过巴勒斯坦问题，通过“亚伯拉罕”协议促成了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等阿拉伯国家的双边关系正常化，巴勒斯坦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巴人民的不满情绪不断累积。2021年，东耶路撒冷暴力和紧张事态升级，加沙地带发生激烈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中国先后两次参与推动安理会举行紧急磋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在会上呼吁，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应当发出一致声音，重申对两国方案的承诺，践行维护国际和平的使命。^② 5月16日，作为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国的中国，派出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亲自主持会议。王毅表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停火止暴，同时，推进巴勒斯坦问题持久公正解决也同样重要。安理会对此承担着重要责任，必须行动起来，推动当事方尽快缓解紧张局势。^③

2022年以来，巴以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和升级。中国等有关国家再度推动安理会进行紧急磋商。4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巴勒斯坦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张军大使在会上阐述了中方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主张，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巴勒斯坦问题都不能被边缘化，更不能被遗忘。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缺乏的不是宏大公平的方案，而是采取行动的勇气。巴以局势反复升级的根本原因，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始终未能实现，“两国方案”始终未能落到实处。中方敦促以色列遵守安理会第2234号决议的规定。^④ 张军呼吁，安理会对

^① 杜一菲、姚大伟：《习近平同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会谈》，《人民日报》2017年7月19日，第1版。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合国安理会就巴勒斯坦局势再次举行紧急磋商》，2021年5月21日，<https://www.mfa.gov.cn/ce/ceun/chn/hyyfy/t1875322.htm>，2022年6月15日。

^③ 《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 巴以中美英法俄就加沙冲突阐述各自立场》，2021年5月16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1/05/1084172>，2022年6月17日。

^④ 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指出，以色列在巴被占领土建立定居点的活动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并且“没有法律效力”，要求以色列马上停止这种活动并履行日内瓦第四公约中规定的占领国义务。

当前形势应该高度重视，采取紧急行动，对外发出一致声音，发挥应有的作用。^①

（二）协调伊核问题取得积极成果

2013年以来，在伊核危机出现转机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一道努力，力促伊核协议的达成。对于伊核问题的协调过程，充分体现了新时期中国日益成熟、稳健，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和谈判的关键节点上敢于担当的外交风范。

2013年6月，温和派的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当选伊朗新任总统后，伊朗和美国都释放出愿意谈判的信号，伊核问题出现转机。2013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外长扎里夫首次与伊核六国外长就解决伊核问题面对面交换了意见。会上，中方呼吁各国应抓住当前出现的有利机遇，务实推进对话。在伊核问题谈判进程开启后，中国在达成全面协议的关键谈判中，派出了高级别政府官员参与会谈，为不断化解分歧，凝聚共识，促进谈判提出方案和意见。^② 2014年2月18日，中国就全面解决伊核问题提出“五点主张”：一是坚持走六国与伊对话道路；二是寻求全面、公平、合理的长期解决方案；三是秉持分步对等原则；四是营造有利的对话谈判气氛；五是寻求标本兼治、综合治理。^③ 经过各方一致努力，伊核问题阶段性协议于11月24日在日内瓦达成。根据协议，伊朗应在2014年7月20日前暂停部分敏感的核项目，而西方则相应减轻对伊制裁，同时双方寻求通过谈判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伊核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④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张军大使：巴勒斯坦问题不能被边缘化》，2022年4月25日，http://un.china-mission.gov.cn/chn/hyyfy/202204/t20220426_10673759.htm，2022年6月17日。

② 《伊核谈判中的中国贡献》，2015年7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7/14/c_128019470.htm，2022年6月22日。

③ 《中国就全面解决伊朗核问题提出“五点主张”》，2014年2月19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4/02-19/5857964.shtml>，2022年6月23日。

④ 《伊核谈判中的中国贡献》，2015年7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7/14/c_128019470.htm，2022年6月23日。

2015 年伊始，伊核谈判进入艰难的冲刺阶段。王毅外长称之为“跑好伊核问题马拉松最后一公里”。由于乌克兰等问题，俄罗斯与西方难以对话，中国担当了协调各方立场的重要角色。继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 2 月就伊核问题通话后，国务委员杨洁篪又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就此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王毅外长也与各方进行了密集的多边和双边会谈，并在 2 月份亲自访问伊朗。通过汇集不同诉求，中方艰难地寻找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①

2015 年 3 月 30 日，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等国外长齐聚瑞士洛桑，为最终达成框架方案做最后的努力。王毅外长在伊核问题外长会议结束前夕，提出了坚持政治引领，坚持相向而行，坚持分步对等和坚持一揽子解决等四点主张。王毅表示，“一年多来，中国在谈判艰难时刻多次提出建设性方案，通过各种渠道积极斡旋。这次外长会上，我也与各方分享了解决焦点分歧的思路，相信会为全面协议达成发挥积极作用。”^② 4 月 2 日，伊核问题六国、欧盟和伊朗在瑞士洛桑发表共同声明，宣布各方已就伊核谈判主要焦点问题达成框架性解决方案，并将立即着手协议文本起草工作。各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推进伊核谈判进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6 月 30 日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最终阶段谈判则是伊核谈判的最后攻坚阶段。由于在核心问题上存在分歧，谈判最后期限被迫多次“加时”。为尽快结束这场艰难的谈判，促成各方达成共识，王毅外长三度奔赴维也纳。^③

2015 年 7 月 14 日，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最终在维也纳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标志着延续了 12 年的伊朗核问题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天”。协议将确保伊朗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伊朗确认绝不寻求发展或获取任何核武器，同时也取消了联合国安理会、多边及单边各国因伊朗核问题

^① 《伊核谈判中的中国贡献》，2015 年 7 月 14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7/14/c_128019470.htm，2022 年 6 月 23 日。

^② 《王毅就伊朗核问题谈判提出四点主张》，2015 年 4 月 1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xghd_673097/201504/t20150401_7583096.shtml，2022 年 6 月 23 日。

^③ 《伊核谈判中的中国贡献》，2015 年 7 月 14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7/14/c_128019470.htm，2022 年 6 月 22 日。

而提出的制裁措施。^①

协议达成后，王毅外长发表讲话指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意识到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始终以建设性姿态参与了伊核谈判全过程。中国并不是矛盾焦点，这可以使中方以更为公正、客观的立场积极开展斡旋。特别是在谈判的一些重要节点，包括谈判遇到困难、陷入僵局时，中方总是从各方共同利益出发，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途径，提出中国的方案。可以说，中国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得到各方高度赞赏和肯定”^②。

然而，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以协议对伊朗核活动的控制太弱，包括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限制，而且协议的条款没有持续足够长的时间等为由，于2018年5月宣布美国从协议中退出，并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作为回应，伊朗开始将铀浓缩到协议允许的水平以上，并减少了与国际核查人员的合作。

在伊核危机再度升级后，中国坚持维护伊核协议。中方表示将坚定致力于维护和执行全面协议，愿就此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为维护多边主义成果而做出努力，并批评美国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是导致危机的根源，反对美国对伊朗实施单方面制裁，呼吁各方应增强紧迫感，全力推动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尤其敦促美国早日无条件重返全面协议并恢复履约。^③ 中方从不同层面，与伊朗、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欧盟等有关各方进行了密集沟通协调，目的就是推动谈判尽快重启并取得进展。2021年，习近平主席分别与伊朗、美国元首通话，亲自就伊核问题做工作。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各方多次视频会晤和通话，就

① 《伊朗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 开启与西方关系新篇章》，2015年7月15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m/gj/2015/07-15/7405313.shtml>，2022年6月24日。

② 《王毅：中国为达成伊核全面协议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2015年7月14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xghd_673097/201507/t20150714_7583229.shtml，2022年6月24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耿爽：推动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尽快重回正轨》，2020年12月22日，<https://www.mfa.gov.cn/ce/ceun/chn/dbtxx/2020070709/2020070711/t1842100.htm>，2022年6月27日。

重启谈判进程提出了具体思路和建议。

(三) 协调叙利亚问题持续努力

2011年3月15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并逐渐演化为巴沙尔政权与反对派武装之间持续的军事对抗。在关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去留的问题上大国之间的立场针锋相对。美国政府公开表态要求其下台，俄罗斯则力挺巴沙尔。中国的立场是坚持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不赞成以武力干预或强行推动所谓“政权更迭”，要求尊重叙利亚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由叙利亚人民自主决定本国的发展道路。^① 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基础上，中国致力于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具体行动包括，支持联合国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协调叙利亚问题有关各方的立场，以及提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主张、意见。

2012年6月，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科菲·安南（Kofi Atta Annan）发起叙利亚问题日内瓦第一次会议，中国与美国、俄罗斯、英国共同出席。会议发表了旨在支持放弃武力、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联合组阁的《日内瓦公报》。中国对此表示支持，并将公报作为叙利亚和谈的基础。2012年10月，杨洁篪外长在与联合国—阿盟叙利亚问题联合特别代表普拉希米（Brahimi）的会谈中，提出了中方关于推进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的倡议，呼吁叙利亚各方全力实现停火止暴，尽快协商制定有关政治过渡路线图。^②

在2013年3月的叙利亚化武危机中，美国一度威胁对叙利亚动武。最终，俄罗斯提出了“化武换和平”的主张，安理会也通过了有关制定销毁叙利亚化武的2118号决议，危机得以化解。中方认为这一决议将叙

^① 《外交部长杨洁篪重申坚持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2012年5月10日，https://www.mfa.gov.cn/web/zxw/201205/t20120510_318735.shtml，2022年6月30日。

^②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谈中方关于推进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倡议》，2012年10月31日，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dhdw_673027/201210/t20121031_5432818.shtml，2022年7月1日。

利亚局势从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拉回到和平轨道，为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提供了新的机遇。为把握这一机遇，中国积极倡议尽快召开日内瓦第二次和谈会议。并且为日内瓦会议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王毅外长在会议前后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2014年1月20日，王毅就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提出“五个坚持”，即坚持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叙利亚问题，坚持由叙利亚人民自主决定国家的未来，坚持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进程，坚持在叙利亚实现全国和解和团结以及坚持在叙利亚及周边国家开展人道救援。^①随后，王毅又分别会见了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穆阿利姆（Mualllem）和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主席杰尔巴（Jarba）。王毅鼓励叙冲突双方应在《日内瓦公报》的基础上展开谈判，找到符合叙国情且能被叙各方接受的解决方案。^②在叙利亚问题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王毅外长重申了“五个坚持”，并提出日内瓦和谈是一个持续过程，应建立后续机制，让谈判不间断，使谈判能谈出结果。^③

然而，叙利亚局势的恶化却呈现愈演愈烈之势。2014年，“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叙利亚的威胁加剧。以美国为首的反恐国际联盟开始在叙境内针对“伊斯兰国”以及部分叙政府和亲政府目标展开空袭。同时，为挽救巴沙尔在内战中的不利局面，2015年9月，俄军开始对叙利亚展开直接军事干预。伊朗和土耳其也通过直接以及支持代理人的方式卷入了叙利亚内战。随着叙利亚危机局势的深化，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政治解决叙问题才是根本之道。

考虑到恐怖主义蔓延的威胁，中国也增加了对叙利亚局势的关注力度，并希望与国际社会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叙问题的尽早解决。2015年12月18日，中国支持安理会通过第2254号决议。该决议同意将叙利亚问题置于联合国框架内实现政治解决，提出“争取在6个月内开展可信、包容各方和没有宗派色彩的治理，制定起草新宪法的时间表和程序，在

① 《王毅提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五点主张》，《世界知识》2014年第3期。

② 《王毅分别会见叙利亚冲突双方谈判代表》，2014年1月23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1401/t20140123_326340.shtml，2022年7月2日。

③ 《王毅提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五点主张》，《世界知识》2014年第3期。

18个月内 在联合国监督下根据新宪法进行自由公正的选举”。^① 王毅外长在决议通过后的发言中充分肯定了决议的重要意义，称其“为政治解决叙问题注入了新动力”。决议通过后不久，杨洁篪国务委员、王毅外长分别会见了访华的穆阿利姆，中方充分发挥了劝谈促和的积极作用。最终，穆阿利姆在访问期间代表叙政府首次公开表示接受安理会第2254号决议，并首次公开表态愿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与反对派举行对话。^②

为更好地把握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关键节点，促进安理会2554号决议的落实，2016年3月中国任命外交经验丰富的谢晓岩大使出任叙利亚问题特使。在上任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解晓岩大使频繁奔赴中东，出访轨迹遍布叙利亚、俄罗斯、英国、欧盟、土耳其、约旦、卡塔尔、伊拉克等国，并通过参加日内瓦会议以及“支持叙利亚和地区未来”布鲁塞尔会议等机会，与有关各方就推进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深入交换了意见。解晓岩指出，叙问题政治解决面临难得的机遇。他呼吁有关各方通过包容性的政治对话，找到符合叙实际、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③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方分歧巨大，叙利亚政治和解方案并未能得到执行。

2017年叙利亚再度出现化武问题，美国对叙境内空军基地发动了袭击。为防止叙利亚冲突持续升级，中国主动采取协调行动。4月13日，王毅外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敦促叙利亚问题各方，特别是美俄之间要加强沟通和协商，避免冲突和对抗。^④

在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下，巴沙尔政府逐渐恢复了对叙利亚中部和南部大约三分之二国土的控制。但土耳其及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

^①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254, December 18, 2015.

^② 韩硕：《叙利亚首次公开表示接受安理会第2254号决议》，2015年12月26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5/1226/c1002_27978686.html, 2022年7月4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陆康就中美元首会晤谈及叙利亚问题答记者问》，2017年4月8日，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dhdw_673027/201704/t20170408_5434503.shtml, 2022年7月4日。

^④ 吴嘉林、伍岳：《王毅就叙利亚局势阐述中方立场》，2017年4月1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4/13/c_1120805760.htm, 2022年7月4日。

依然占据着叙西北部，库尔德人则控制着叙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此外，残余的极端组织势力也还在叙利亚活跃，全面恢复秩序任重而道远。2021年7月17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大马士革同叙利亚外长米格达德举行会谈。王毅再度强调，全面解决叙利亚问题，关键在于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确立的“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原则，各方形成合力，切实推进叙利亚问题的全面解决。王毅还提出了坚持尊重叙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民生为先和加快重建，坚持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和坚持包容和解的政治解决方向等四点主张。^①

（四）协调利比亚问题初见成效

2011年利比亚内乱后，北约利用联合国1973号决议，以“保护的责任”为名，通过空袭行动支持利比亚反对派推翻了卡扎菲政权。但此后利比亚并未能通过民主选举实现国家政治重建。自2014年起，利比亚国内不同势力之间为权力展开斗争，逐渐演化出西部“合法”政府与东部“合法”议会之间相互对峙与冲突的局面。区域内外国家也纷纷依据自身利益选择支持利国内不同势力，利比亚蜕化为各国参与竞争的战场。在利比亚问题上，中国坚持国际社会应推动利比亚有关各方积极参与包容性政治对话，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分歧的立场，支持联合国、地区国家、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继续在帮助利恢复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②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履行大国职责，在促进利比亚国内停火以及政治选举过程方面扮演积极角色。

为实现利比亚问题的政治解决，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协调外交行动。2015年9月4日，在会见利比亚外长达依里时，王毅外长阐述了中国政府对解决利比亚问题的三点基本原则：即任何解决利问题的方案都应

^① 《王毅阐述中方关于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四点主张》，2021年7月18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jzh/202107/t20210718_9137646.shtml，2022年7月7日。

^② 《安理会2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大使主持安理会审议利比亚局势》，2015年2月18日，https://www.mfa.gov.cn/web/zwbd_673032/wshd_673034/201502/t20150219_5465172.shtml，2022年7月7日。

尊重利人民的意愿和选择，解决利问题根本之道在于政治对话以及解决利问题应标本兼治。^① 2018年上半年，中国驻利比亚使馆临时代办王奇敏又分别两次会见利比亚国家最高委员会领导人和团结政府官员，表示中方支持《利比亚政治协议》^② 和联合国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萨拉迈(Salame)提出的关于在联合国领导下恢复利比亚人自主的包容性政治进程的《联合国行动计划》，希望利比亚能顺利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早日实现国家安全与稳定。11月，马朝旭大使在安理会发言中强调，应加强联合国在利比亚问题上的斡旋作用。他还呼吁利比亚邻国、非盟、阿盟、欧盟等各方加大同联合国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帮助落实联合国行动计划。^③

由于利比亚冲突趋势有增无减，为停止军事升级、促使利比亚回到内部和解进程的轨道上，2020年1月19日，德国主持召开利比亚问题柏林国际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哈夫塔尔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和萨拉杰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各派5名代表参加的“5+5”模式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以便就全面停火进行谈判，并提出了武器禁运、解散民兵组织、外国撤军及重返政治进程等。但由于萨拉杰和哈夫塔尔等关键人物均未能到场，协议基础因而比较薄弱。尽管如此，各方仍认为峰会成果来之不易。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作为习近平主席的特别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并肯定了峰会取得的成果。^④

柏林峰会后，为推动峰会成果得到兑现，中国继续展开外交行动。1月30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中国呼吁利比亚各方、有关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将柏林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成果落到实处。

^① 《王毅阐述中方对解决利比亚问题的三点基本原则》，2015年9月4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zhd/201509/t20150904_352463.shtml，2022年7月7日。

^② 2015年12月，联合国支持利比亚各派在摩洛哥签署了《利比亚政治协议》，设立总理委员会，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并举行选举。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马朝旭大使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的发言》，2018年11月8日，<https://www.mfa.gov.cn/ce/ceun//chn/hyyfy/t1611752.htm>，2022年7月8日。

^④ 田园：《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和平还有多远》，《光明日报》2020年1月22日，第11版。

中国方面还表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将继续支持和推动利比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支持利比亚人民对和平与安宁的追求，为利比亚恢复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① 2月12日，在柏林会议有关利比亚停火协议结论的基础上，安理会通过了旨在遏制利比亚全境暴力升级的2510号决议，要求交战各方承诺“持久停火”。中国赞成这一决议。7月8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利比亚问题高级别公开视频会议时，提出关于解决利比亚问题的四点意见：第一，推进全面停火止暴；第二，坚持政治解决方向；第三，消除危机外溢影响；第四，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王毅指出，这是安理会有有效履行职责的重要前提，也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力保障。^② 10月，由联合国支持的日内瓦第四轮会谈举行后，利比亚交战双方代表签署协议，同意在该国所有地区永久停火，这标志着利比亚“实现和平与稳定的重要转折点”^③。

在达成停火协议后，中国希望再接再厉，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促成利比亚国内选举。为评估利比亚国家的政治进展，为利比亚可能在12月份举行的全国大选做准备，以及继续讨论外国军队和雇佣军撤离等重要问题，2021年6月23日，中国与各方共同参与了第二届利比亚问题柏林会议。然而，利比亚国内的条件并不利于举行选举，选民两极分化严重，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根深蒂固。本应负责审查候选人并裁决争议结果的司法机构也缺乏公正性。^④ 联合国支持的旨在为利比亚选举铺平道路的会谈未能取得成功。在利比亚政治进程的不确定性继续上升的情况下，2022年5月，中国代表在安理会审议利比亚问题时，再度呼吁坚持政治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吴海涛大使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的发言》，2020年1月30日，<https://www.fmprc.gov.cn/ce/ceun/chn/hyyfy/t1737708.htm>，2022年7月8日。

^② 《王毅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利比亚问题高级别公开视频会议》，2020年7月9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20-07/09/content_5525202.htm，2022年7月10日。

^③ Pip Cook, “Libya’s Rival Forces Agree to Ceasefire”, October 23, 2020, <https://genevasolutions.news/peace-humanitarian/libya-s-rival-forces-agree-to-ceasefire>, 2022年7月10日。

^④ *Steering Libya Past Another Perilous Crossroads*, March 18, 2022, <https://www.crisisgroup.org/middle-east-north-africa/north-africa/libya/b85-steering-libya-past-another-perilous-crossroads>, 2022年7月10日。

解决利比亚问题的大方向，各方要保持对话势头，尽快就宪法基础、选举时间表等重要问题达成全面共识，为举行选举、实现政治过渡创造必要条件。^①

（五）协调也门问题坚持不懈

也门是另一个深度卷入阿拉伯剧变危机的中东国家。2013年也门总统萨利赫（Saleh）在国内抗议声中宣布下台，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哈迪（Hadi）。然而遗憾的是，拟议中的也门政治过渡也同样未能实现。2014年9月，长期占据也门北部的胡塞武装（Houthi）攻占了首都萨那，也门局势急转直下。2015年2月15日，安理会一致通过2201号决议，要求也门各方通过协商对话和平解决分歧，推动也门各方实现和解、尽快恢复局势稳定。但胡塞武装拒绝接受决议，并于2015年3月控制了也门的大多数省份，哈迪被迫流亡。考虑到伊朗支持胡塞武装崛起所造成的威胁，为恢复哈迪政府，沙特领导盟军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也门战争打响。

也门战争爆发后，中国坚持以海合会倡议^②和安理会2201号决议作为解决也门问题的依据，积极参与也门和平进程，劝和促谈，努力拉近各方距离、弥合各方分歧。2015年4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应邀同沙特国王萨勒曼（Salman）通电话时，敦促加快也门问题政治解决进程。^③2015年9月29日，王毅外长出席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安理会五常外长与联合国秘书长工作会晤。在讨论也门局势时，王毅表示，也门持续危机及其溢出效应需要五常高度重视。五常应发挥各自作用，推动各方切实落实安理会决议和海合会倡议，通过对话寻求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戴兵大使在安理会审议利比亚问题时的发言》，2022年5月26日，http://un.china-mission.gov.cn/chn/zgylhg/202205/t20220527_10693320.htm，2022年7月10日。

^② 2011年也门爆发民众抗议运动后，海合会提出了旨在化解也门危机的《倡议书》，内容包括萨利赫总统将权力和平移交给副总统、于30天内辞职、成立由反对派领导的联合政府并举行总统大选等。

^③ 《习近平同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通电话》，《人民日报》2015年4月18日，第1版。

同时应积极发挥主要地区国家的作用。^① 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期间，两国发表了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其中强调“维护也门统一、独立和主权的坚定立场，希望也门各社会、宗教、政治派别维护自身民族团结，避免采取任何可能造成也门社会分裂和混乱的决定，支持也门合法政权，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及海合会关于也门的倡议。”^②

2015年至2016年，中国驻也门大使田琦先后数十次与也门总统哈迪、总理本·达格尔、副总统兼总理巴哈赫、也门全国人民大会党委书记祖卡以及胡塞武装领导人萨马德等也门国内各方领导人会面或通电话。田琦大使在与他们的对话中表达了中方对也门问题的关注，以及希望政治解决也门问题的愿望。田琦还多次会见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艾哈迈德（Ahmed），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及艾哈迈德特使的斡旋工作，推动也门问题早日回归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2017年3月2日，在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助理秘书长欧维什格时，田琦大使强调中方高度重视海合会在解决也门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愿与海方共同努力，推动也门问题早日得到政治解决。2018年12月6日，在瑞典也门和谈会议期间，中国新任驻也门大使康勇与也门代表团团长耶曼尼外长及胡塞代表团团长阿布杜·萨拉姆等进行了接触，康勇表示，希望也门和谈双方抓住机遇，积极努力，缩小分歧，为也门人民带去和平。^③

南也门分离主义组织南方运动自2017年5月宣布成立南方过渡委员会（STC）后，一直与哈迪政府部队之间进行军事对抗。2019年8月，双方在也门南部的亚丁发生严重冲突，造成数百人死伤，哈迪政府被南方过渡委员会驱逐出了亚丁。8月7日，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驻也门大使共同就亚丁局势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对亚丁暴力活动升级的担忧，

^① 《王毅：推动对话谈判，政治解决也门问题》，2015年9月30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1509/t20150930_334809.shtml，2022年7月11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人民日报》2016年1月20日，第2版。

^③ 《新一轮也门和谈在瑞典举行》，2018年12月7日，<https://www.fmprc.gov.cn/ce/ceyem/chn/sgdt/t1619926.htm>，2022年7月12日。

呼吁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危机升级后，中国在也门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发挥了积极的协调作用。康勇大使先后多次与也门总理、外长、南方运动领导人亚辛以及阿联酋驻也门大使等人士举行会谈。康勇表示，中方关注也门南部局势进展，始终认为武装冲突无益于当前局势，希望也门问题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① 康永还强调，中方在也门问题上一直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文件、海合会倡议及其执行机制和也门全国对话会成果文件的基础上政治解决也门问题，中方将继续这一客观公正立场，在亚丁问题解决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② 2019年，11月5日，在沙特的直接干预下，哈迪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签署了有关权力分配的《利雅得协议》，中国在协议签署前与各方的接触也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协议签署后，康勇大使表示了对协议的欢迎，并呼吁各方履行协议内容，使其“成为也门问题全面政治解决进程的起点”。^③ 康大使还利用多种场合敦促双方克服困难，为落实协议而努力。

在哈迪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最终于2020年12月同意组建联合政府，实现了也门南部大部分地区名义上的统一后，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也就成为了也门的最后症结。中国则继续坚持双方通过和谈解决问题。在沙特表达出政治和解的意愿后，中国表示支持沙特和也门政府发出和平解决冲突的积极信号和承诺。2021年4月12日，康勇大使在参加P5+4（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欧盟、德国、瑞典、科威特）也门问题高官会时，呼吁在也门立即降低冲突、实现停火，并希望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有关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抓住当前的良好契机相向而行，推动也门和平进程不断向前发展，实现新的突破。^④ 2022年4

^① 《康勇大使会见也门副外长哈德拉米》，2019年9月4日，http://ye.china-embassy.gov.cn/sgdt/201909/20190904_1865007.htm，2022年7月12日。

^② 《康勇大使会见也门南方运动领导人亚辛》，2019年8月21日，http://ye.china-embassy.gov.cn/sgdt/201908/20190821_1864987.htm，2022年7月12日。

^③ 《康勇大使会见也门副总理罕白什》，2019年11月14日，http://ye.china-embassy.gov.cn/sgdt/201911/20191114_1865172.htm，2022年7月12日。

^④ 《康勇大使参加P5+4也门问题高官会》，2021年4月13日，<https://www.mfa.gov.cn/ceyem//chn/sgdt/t1868593.htm>，2022年7月13日。

月，在联合国的斡旋下，自内战爆发七年后，也门交战双方首次同意了暂时休战。然而，也门局势依然非常危险，将停火转变为政治进程的难度非常大。

结语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协调历程，中国经历了从最初仅在巴勒斯坦问题等少数中东热点事务中的谨慎参与，到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积极行动有所作为，再到新时期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外交协调行动的过程。尽管中国在中东热点问题的治理方面并不处于主导位置，但越来越主动作为，积极开展劝和促谈的外交行动，标志着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协调外交正加速走向成熟。总体来看，中国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协调已经形成了以多边主义为原则、特使机制为特色、全方位服务于中国中东战略为目标的协调外交实践。

首先，坚持多边主义是中国参与中东问题大国协调的基本原则。冷战后，世界开始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多边主义成为国际社会充分凝聚共识、照顾彼此关切、平等协商化解危机来维护国际秩序的根本保障。在中东地区事务上，中国始终强调多边主义原则的重要性。为此，中国一贯坚持在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框架下讨论中东安全问题，并通过与阿盟、非盟和海合会等地区组织合作来发挥积极作用。在实践中，联合国安理会以及有关中东热点问题的多边会谈机制，也一直是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协调的主要平台。通过多边主义路径，中国积极配合其他大国以及各种国际和地区性组织促成相关协议的达成，为中东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创造条件并营造了良好的谈判氛围。

其次，特使机制是中国参与中东问题大国协调的一项重要特色。2002年，在中东和平进程遭遇巨大挫折的背景下，中国开始正式设立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职务，开启了中国协调中东热点问题的机制创设先河，体现了中国外交实践的创新。迄今为止，中国已经设立了五位具有

长期中东外交经历的资深外交官担任过这一职务，还在2016年任命了叙利亚问题特使。特使机制在中国参与中东问题协调的进程中具有多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一是有助于中国政府集中而有效地在相关焦点问题上发挥劝和促谈作用；二是有助于中国方面与联合国及其他有关国家、国际组织的特使专门机制进行对接，促进相互间的沟通与合作，增强了中国在中东事务上的话语权；三是有利于对外宣传中国的中东政策；四是体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最后，服务于中国中东战略始终是中国参与中东问题大国协调的主要目标。多年来，中国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协调外交在政治、经济与安全方面都产生了多重效应。政治方面，中国中东协调外交提升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塑造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加强了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促进了与中东国家的友好交流。经济方面，中国中东协调外交促进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关系，有利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地区的顺利推进，也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安全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安全方面，中东地区的安全与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安全关系紧密，参与中东地区的安全治理也间接增进了中国本土的安全。

The Process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Major Powers Coordination on Hotspot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Wang Bo and Mu Chunhuan

Abstract: Since China announced its reform and opening in the late 1970s, its diplomacy has gradually transcended ideology. As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China has begun to participate in coordinating hotspot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by mediating the Palestinian issue and conducting shuttle diplomacy to deal with the Gulf crisis. Although limited by its strength in the initial stage, China could not have a substantial impac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this participation has created a good atmosphere for peace talks. After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the Middle Eas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peripheral strategy and a major source of energy, as well as China's ability to coordinate the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China not only continued to coordinate on the Palestinian issue but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litical peace talks on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Since the 18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China has continuously opened up new prospects of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hered to the new principle of "dialogue rather than confrontation, partnership instead of alliance" in coordinating the hotspot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participated more extensively in the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of the hotspot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positive role.

Key Words: China's diplomacy; Diplomatic coordination; The Middle East; Hotspot Issues



扫一扫
获得更多新书信息

ISBN 978-7-5227-2134-7

9 787522 721347 >

定价：105.00 元